现代教育与教学创新

2026年11月 第1卷第6期

元代文人交游视角下倪瓒书法实践研究

胡 旭

河北美术学院，石家庄

摘　要 | 倪瓒作为元末江南文人圈的核心代表，其书法简淡萧散的艺术面貌并非单纯人格精神的内向投射，而是根植于元末江南密集的文人交游网络之中。本文以倪瓒早、中、晚三期文人交游史实为基础，结合《清閟阁集》存世诗文尺牍、传世墨迹题跋，从藏品互赏、雅集酬唱、同道切磋三类交游场景出发，将倪瓒交游划分为青年居乡鉴藏交游、中年漂泊隐逸雅集、晚年乱世尺牍酬答三阶段，进而解析上述交游场景对其书法实践的作用机制，揭示交游网络与书风嬗变的双向互动关系，考证交游圈层变迁如何作用于倪瓒的取法选择、审美观念与书写实践，还原倪瓒书法风格动态生成的历史语境，进而审视元代江南文人圈层内部书法审美传播、交融的运行机制。

关键词 | 元代文人；倪瓒；文人交游；书法实践

Copyright © 2026 by the author(s).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引言

倪瓒是元末江南隐逸文人的代表人物，诗、书、画三艺兼善，在后世艺术史叙述之中，绘画成就长期遮蔽其书法价值。当下学界关于倪瓒书法的研究，大致沿着技法考辨、绘画题跋、隐逸文化、交游史实四条路径展开。技法研究多梳理倪瓒取法晋唐的学书脉络，划分书风演变阶段，解析小楷用笔、结体的艺术特征；群体文化研究习惯于将倪瓒归入元末隐士书家序列，依托隐逸思想、道教文化解读其尚逸的审美取向[1]；题跋研究则以画作附属书迹为样本，阐释诗书画合一的艺术范式[2]；交游相关成果多着眼于绘画演变，对于交游活动如何具体作用于书法本体，大多停留在背景层面的简单铺陈，缺少史实、墨迹与书风之间的互证分析。

既有研究普遍存在一种阐释惯性：将倪瓒简淡萧散的书法风格归为孤高避世人格的内向投射，把文人交游当作烘托人物精神的时代注脚，交游网络并未真正作为变量介入书风生成的讨论。事实上，元代江南雅集鉴藏之风盛行，藏品共赏、诗酒酬唱、尺牍往来构成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交游并非单纯社会交际行为，同时也是法书传观、审美交流、笔墨实践的现实场域。倪瓒一生交往繁复，《清閟阁集》留存大量酬答诗文、往来书札，记录其与张雨、黄公望、陈植、杨维桢等文士的交往细节。就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而言，楚默对倪云林书法思想与小楷艺术性的讨论[3]，黄珊等对倪瓒小楷早、中、晚三期风格的梳理，何学森以画款为对象对书风基调与流变的考述，王宣懿将倪瓒置于杨维桢、吴镇等隐士书家群体中所作的流派性分析[4]，分别在本体风格、画款形态与群体比较上取得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5-2026学年校级科研培育项目“元代文人交游视角下倪瓒书法实践研究”(25XJYB04)最终成果。

作者简介：胡旭，河北美术学院书法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书法篆刻史论研究。

文章引用：胡旭. 元代文人交游视角下倪瓒书法实践研究[J]. 现代教育与教学创新，2026，1(6)：165-169.

https://doi.org/10.68070/me2na174

扎实推进；然上述成果多将交游视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注脚，未将其作为解释变量纳入书风生成的因果链条。本文的推进在于：其一，把交游由背景转化为变量，考察早、中、晚三期交游圈层更迭与书风嬗变之间的同频关系；其二，以藏品互赏、雅集酬唱、同道切磋三条可实证路径，实现交游史实、传世墨迹与书风分析的三方互证。本文以文人交游为核心线索，对应倪瓒早、中、晚不同人生阶段，厘清交游圈层更迭、交往形态变迁，挖掘藏品互赏、雅集酬唱、同道切磋三类活动介入书法实践的内在机制，辨析交游语境与书风嬗变之间双向互动关系，以此还原倪瓒书法生成的历史语境，深化对元代江南民间文人书法生态的理解。

1 元末江南文人交游的社会文化生态

元朝一统之后，江南地区虽历经赋税重压与后期战乱冲击，但文化文脉并未中断。科举时断时续，士人失去传统仕途晋升通道，大批文人转向江湖，寄情于书画、诗文、鉴藏。世家士族、地方文士、道士隐逸群体相互勾连，形成地域色彩浓厚的文人社交网络。

官方书学体系影响力趋于弱化，法书名迹的传播不再主要依靠馆阁体系，大量晋唐、两宋墨迹流转于江南私家藏家之手。书画鉴藏不再只是少数贵族的雅好，成为江南文人圈层开展社交的重要媒介。雅集活动遍地开花：或于私家园林、别业庭院，或泛舟太湖、松江水域，文人相聚观览书画、赋诗唱和、题跋赠答。在这样的场景之中，观帖、写诗、题书融为一体，交际活动和艺术创作彼此缠绕。对于元代文人而言，书法不只是书斋之内临摹研习的结果，也诞生于社交往来的现实场景，交游深刻参与书法资源获取、审美观念塑造与书写实践全过程。

倪瓒出身无锡富庶的倪氏家族，青年时代家境殷实，清閟阁是其开展文人交游的核心物质载体。阁中广聚古籍、法书、名画、古器物，成为江南文人向往的文化据点。《清閟阁集》诸多题跋诗文记录宾客到访，登阁观览藏品的场景：“云林有清閟阁、云林堂，清閟阁尤胜，客非佳流不得入。尝有夷人道经无锡，闻瓒名，欲见之，以沈香百斤为贽，绐云适往惠山。翼日载至，又云出探梅花。夷人以倾慕不得一见，徘徊其家。瓒密令人开云林堂使登焉。”[5]张雨、虞集等名士都曾到访清閟阁，观览阁中所藏晋唐法帖。

清閟阁的意义不止于私人藏书楼，它搭建起一个开放的文化社交空间。一方面，倪瓒依托自家丰厚藏品，得以近距离摩挲历代法书真迹，构建自身的古法认知；另一方面，各地文人慕名到访，带来阁内未收藏的卷轴墨迹，藏品互观成为往来交流重要内容。依靠清閟阁的物质条件，青年倪瓒得以跻身江南上层文人圈层，早期书法取法晋唐的基础，正是在这一交游环境之中逐步建立。当然，这份物质条件并不长久，至正之后赋税苛重，社会动荡，倪瓒散尽田产，弃家漂泊，清閟阁的雅集功能随之消散，其交游的场域、对象、形式，也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

2 倪瓒交游圈层的阶段划分与交往形态

结合倪瓒人生境遇变迁、交往对象、交游载体，可将其交游历程划分为青年居乡鉴藏交游、中年漂泊隐逸雅集、晚年流寓尺牍酬答三个阶段。圈层更迭的背后，是交往目的、交往媒介、活动场域的全面改变，这种改变又与书法实践的演变形成时间上的同频。

青年居乡阶段大致为大德末年至至正初年，此时倪瓒安居无锡，清閟阁是交游的主场。往来人物多为江南世家子弟、鉴藏家、道教文人，代表人物以张雨最为典型。张雨身为茅山道士，游历南北，见多内府与江南私家珍藏，每次到访清閟阁，常常携卷轴共赏。这一时期交游核心形态为鉴藏观摩。交往围绕书画古物展开：友人来访出示随身法书，倪瓒出示家藏旧迹，彼此题识品评。交际重心偏向古物鉴识，而非同辈之间直接笔墨切磋。通过这类交游，倪瓒得以接触刻帖无法传递的墨迹笔意，夯实晋唐书法的审美根基。此阶段面对面雅集酬唱虽然存在，但尚未成为主流，书法实践更多来源于阁中藏品观摩与书斋临摹，交游的价值集中于范本资源的拓展。

至正初年，倪瓒散尽家产，弃家遁迹，开启漂泊江湖的人生。失去清閟阁的物质依托，交游主场由私家宅邸转移至太湖、松江一带的舟船、友人别业。交游圈层发生明显置换，交往对象转向黄公望、陈植、王蒙等一批同样遁迹江湖的隐逸书画家。交往形式由“访客来阁观藏”转变为江湖相聚的雅集唱和。文人泛舟湖上，相聚宴集，赋诗、题画、互赠作品成为常态。藏品来源不再局限于自家收藏，更多来自走访各处友人私藏。此时交游不再仅仅是观摩古帖，同辈同道之间艺术观念交流成为重点。与黄公望往来尤密，二人多次聚会，互为题画题诗，在交谈之中交换画理书学见解。漂泊流离的生存处境叠加隐逸群体的思想共鸣，不断重塑倪瓒的艺术认知，书风也由此迎来重要转型。

元末战火蔓延江南，社会秩序崩坏，不少故交离世离散，大规模的面对面雅集难以维系。倪瓒辗转寄居各地友人家，交游圈层持续收缩，尺牍书札上升为维系人际关系最主要媒介。《清閟阁集》保

存大量晚年书简，多为寄赠友人、倾诉境遇、酬答诗文所作，如：“青苔网庭除，旷然无俗尘。依微樵径接，曲密农圃邻。鸣禽已变夏，疏花尚驻春。坐对盈樽酒，欣从心所亲。”相隔山水，无法相聚雅集，便以手札传递情谊。尺牍本身即是书写成品，信件寄达友人手中，手札墨迹完成流转，审美交流就在纸简传递之间实现。交往由实体空间的相聚，转向纸本媒介的隔空对话。书写褪去雅集当众展示的表演属性，更多回归日常实用通信，书写心态趋于松弛自然，深刻影响其晚年书法面貌。

3 文人交游介入书法实践的三条实现路径

文人交游并非笼统的时代背景，而是通过藏品互赏、雅集酬唱、同道切磋三条可实证的路径，介入倪瓒书法实践。三条路径各有侧重，其一藏品互赏解决范本资源获取问题；其二雅集酬唱提供高频的现实书写场景；其三同道切磋实现书画观念互通与审美共振。三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倪瓒书风演变的外部条件。

在印刷条件有限的元代，晋唐法书真迹流传稀少，普通书家接触墨迹的机会十分有限。刻帖经翻刻流转，笔法细节多有损耗，想要体会古人笔墨精微，必须依托私家藏家之间的互相观览。藏品互赏的交游行为，直接决定书家能够看到什么样的范本，深刻影响取法视野。青年时期张雨到访清閟阁携来的卷轴，是阁中藏品之外重要的补充。倪瓒诸多题跋记录与友人共览法书的体验。与刻帖阅读不同，观摩墨迹可以直观感受起收转折、墨色浓淡，这种视觉经验会潜移默化改造书写认知。中年漂泊之后，失去家藏条件，倪瓒转而走访各处友人宅邸观赏藏品，此时的观摩不再是少年纯粹的技法学习，而是带着已经形成的审美眼光和古帖展开对话。需要明确，藏品互赏不等于直接模仿复制，更多是审美熏陶与眼界拓展。交游提供接触原作的机会，但如何消化、取舍古法，依然取决于书家自身。藏品互赏为倪瓒兼融晋人与唐法提供现实条件，是其早期遒美小楷得以形成的重要外部推力。

雅集酬唱是元代文人交游最具代表性的形态。众人相聚赋诗之后，将诗文书写于画卷、纸张之上，赠予同游之人。现场题诗、题画本身就是书法实践，书写内嵌于社交流程之中。这类书写带有明显社交属性，和书斋闭门临摹古帖的创作状态存在区别。太湖、松江一带的文人雅集之上，倪瓒大量题画书迹就此诞生。为完成社交酬答，需要当众完成书写，在场同好的审美趣味，会形成无形的审美参照。元末隐逸圈层普遍崇尚简淡清逸，这种集体审美，在一次次雅集书写之中得到强化。但应酬书写并不等同于一味迎合世俗趣味。身处同一雅集，倪瓒并未追随杨维桢奇崛狂放的书风，体现出主动的审美筛选。雅集酬唱带给倪瓒，一方面是高频次的现实书写场景，持续锤炼笔墨；另一方面是圈层共享的审美语境，为书风转向清隽简逸提供环境土壤。

中年阶段与黄公望、陈植等亦书亦画的隐逸文人相交，带来交游的另一重价值：同道之间的艺术切磋，推动书画观念互渗。元代“诗书画合一”并非只是书本上的理论口号，而是文人相聚论艺，在对话品评之中不断深化形成。倪瓒书名被画名掩盖，传世书法大半依附绘画题跋，绘画思想深刻渗透书法审美。而这类书画互通的认知，很大一部分来自和绘画同道的当面交流。黄公望论画崇尚简远逸趣，二人相聚论画谈艺，画学思想自然流入对书法的理解。倪瓒书法追求删繁就简，去除繁丽修饰，与绘画“逸笔草草”的追求互为表里。

同时交游具备双向性，并非倪瓒单方面接受他人影响。倪瓒的题跋书法也会被同道观赏品评，反过来促使他打磨题画书写。同道切磋，实现书学、画学观念的互相激荡，推动书画审美互渗，塑造倪瓒书法独特的艺术气质。

4 交游视域下倪瓒书风嬗变再解读

学界一般将倪瓒书法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遒美精妙；中期清隽虚和，融入隶意；晚年淡远静穆、萧散率意。过往解读多从个人遭际、内在心性展开。将交游维度纳入考察可以看到，人生境遇变迁同步带来交游圈层、交往形式的更迭，交游作为外部条件参与书风演变，但倪瓒始终保有独立审美判断，对圈层内部多元艺术取向加以取舍扬弃。

青年居乡时期，交游以清閟阁为中心，核心交往活动是藏品互赏。依托家藏以及友人来访带来的法书墨迹，倪瓒得以反复观摩晋唐名迹。这一阶段其小楷结体瘦长严谨，用笔精整，兼有欧阳询、褚遂良唐楷法度，又浸润晋人散逸意趣。观此一时期题跋小楷，结字纵长，横画微仰，竖画挺拔，行笔不激不厉，点画起止皆守节度，于欧阳询险劲之外兼得褚遂良之疏瘦，清整精雅。此时交游以鉴藏观摩为主，同辈之间直接笔墨切磋相对有限，个人艺术面貌尚未完全凸显，书写主要体现对于晋唐经典法度的承袭。交游的作用集中于范本供给，为早期书风打下坚实的古法根基。

中年弃家漂泊，交游转向黄公望等隐逸书画家，江湖雅集成为主要交往方式。生存境遇发生巨大改变，加上隐逸同道之间思想与审美共振，倪瓒书风发生明显转型。不再执着唐楷严密工整，书写融入隶书笔意，笔画趋于简省，褪去雕琢之气，走

https://doi.org/10.68070/me2na174

向清隽虚和。以其至正年间题《六君子图》《渔庄秋霁图》诸跋观之，字势由纵长渐趋方扁，捺笔时见波挑之意，楷中带隶，已非早年唐楷面目。大量题画书法诞生于雅集酬唱场景，书法笔墨自觉配合绘画简淡意境，诗书画之间融合进一步深化。书风转型，不单单是内心心境变化的结果，隐逸圈层整体尚逸的审美氛围[6]，在一次次聚会、题跋、品评实践之中，加速了风格蜕变。

晚年战乱频仍，大规模雅集消散，尺牍成为交游主要载体。手札以通信酬答为目的，属于日常实用书写，不再需要雅集当众展示的刻意经营。书写心态松弛，笔法圆熟，修饰成分不断褪去，呈现淡远静穆、萧散率意的艺术面貌。至正末以降，如题《容膝斋图》《幽涧寒松图》诸跋及往来手札，笔法愈发圆融，不刻意安排而疏密自生，似不经意而法度自完。这类书迹生成的出发点是维系人际交游，并非刻意进行艺术创作，社交实用属性反而促成艺术境界升华。当然，这种“书写解放”建立在前半生深厚临摹功底之上，交游场景提供心态条件，内在技法积淀才是根基。

倪瓒与杨维桢拥有大量交际往来，同处元末江南文人交游网络，参与不少共同雅集，但是二者书法面貌判若云泥。杨维桢书风奇崛雄肆、纵横跳荡；倪瓒始终坚守内敛清简的格调。这一对比极具启示意义：交游圈层会提供范本资源、审美风气与书写场景，但不会直接决定书家最终风格。同一圈层内部存在多元审美取向，书家会基于家学渊源、早年取法、人格气质完成自我筛选。倪瓒接纳元末“尚逸”的时代大趋势，却拒绝狂放诡谲的表达路径。交游是外部条件，书家拥有主体性，会对圈层艺术资源进行吸收或者拒斥，不能简单把风格结果完全归因于社交环境。

5 交游视角对倪瓒及元代书法史的启示

把倪瓒书法放回文人交游网络之中重新审视，可以修正以往部分固化的研究认知，同时为理解元代江南民间书法运行机制提供重要个案。

传统阐释常常简化因果逻辑：倪瓒人格孤高清逸，故而书法萧散简远。人格、心性确实深刻影响艺术品格，但是这种单向度阐释容易忽略艺术生成的社会语境。倪瓒的书法演变，不只是内心精神向外投射，也是在持续不断的文人交往之中，获取范本、参与书写实践、接受审美熏染，再经由个体筛选融合之后的结果。人格与交游语境二者互为作用，不可偏废，不能将交游仅仅当作点缀性背景。元代官办书学影响力衰弱，法书名迹的传播、审美风尚的流转，很大程度依托民间文人圈层完成。文人交游网络承担多重功能：通过藏品互赏实现墨迹范本的流转；依托雅集酬唱制造大量书写实践；依靠同道切磋完成艺术观念传递。官方馆阁不再是书法传承的唯一中心，江南民间交游圈层成为书法延续与革新的重要场域。倪瓒个案充分印证：研究元代文人书法，必须重视文人社交网络这一民间传承载体。

梳理倪瓒存世墨迹，无论是各类题画题跋，还是大量尺牍手札，绝大多数都诞生于交游活动。题画是赠予同游友人，尺牍用于寄送给远方故交。这些作品从诞生之初就带有社交功能，在文人之间流转传播，并非书家闭门创作之后束之高阁的习作。如果剥离交游生成语境，仅仅孤立开展笔墨技法分析，就丢失作品原始功能与历史情境。正视倪瓒书迹“交游产物”的属性，有助于更加完整理解其笔墨形态、形制、书写心态，实现本体分析与历史语境的结合。

结语

倪瓒简淡萧散的书法面貌，是个体心性、临摹功底与元末江南交游网络多重合力造就的结果。青年阶段依托清閟阁开展鉴藏交游，依靠藏品互赏观摩晋唐法书实物，奠定晋唐法度根基；中年漂泊江湖，和黄公望等隐逸文人开展雅集酬唱、同道切磋，社交书写场景与圈层审美共振，推动书风由工整精谨转向清隽虚和，书画互渗观念持续深化；晚年遭遇战乱，面对面雅集衰落，尺牍手札成为维系交游的媒介，实用通信书写促成晚年淡远萧散的笔墨境界。

藏品互赏、雅集酬唱、同道切磋构成交游介入书法实践的三条路径。交游为倪瓒供给范本资源、创造书写场域、提供审美参照，但倪瓒始终保持审美主体性，对圈层多元艺术取向进行吸收与扬弃。交游与书法实践呈现双向互动：交游塑造书法实践；而题跋、尺牍等书法作品，反过来又成为维系文人社交网络的物质媒介。

倪瓒这一个案也揭示元代江南民间书法的运行特质：在官方书学力量弱化的时代，文人交游网络承担范本传观、审美交流、催生书写实践的重要作用。将书家置于社交网络，将作品放回生成的历史现场，可以跳出单纯“风格自律论”的研究范式，实现笔墨本体研究与社会文化语境研究互补，为元代文人书法研究提供更为立体的考察路径。

参考文献

[1] 黄珊，蒋直真. 倪瓒小楷风格分析研究[J]. 书法赏评, 2024(1): 7-9.
[2] 何学森.倪瓒画款书法的基调和流变[J]. 中国书法, 2012(5): 73-78.

[3] 楚默.倪云林的书法思想及小楷的艺术性[J]. 江苏教育, 2019(93):76-80.
[4] 王宣懿.元末隐士书家群体流派性研究——以杨维桢、倪瓒、吴镇为例[J]. 中国民族博览, 2024(23): 24-26.
[5] 倪瓒.清閟阁集[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367-368.
[6] 潘美红.元代后期的隐士书法研究[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5.

A Study of Ni Zan's Calligraphy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uan Dynasty Literati Social Circles

Hu Xu

Hebei Academy of Fine Arts, Shijiazhuang

Abstract: As a co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Jiangnan literati circle at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Ni Zan's calligraphy, characterized by simplicity and sparsity, is not merely an inward projection of his personal spirit, but is rooted in the dense network of literati interactions in late Yuan Jiangnan.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Ni Zan’s literati interactions in his early, middle, and late periods, combined with extant poetry, letters, and calligraphic inscriptions from the *Qingbige Collec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ree types of interaction scenarios: mutual appreciation of collections, elegant gatherings with poetic exchanges, and scholarly exchanges with peers. Ni Zan’s interaction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youthful local exchanges centered on collection appreciation, middle-aged wandering and reclusive gatherings, and late-life exchanges of letters amid chaotic times.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these interaction scenarios influenced his calligraphic practice are further analyzed, revealing the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evolution of his script. This study also investigates how changes in literati circles affected Ni Zan’s choice of models, aesthetic concepts, and writing practices,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which his calligraphic style dynamically developed, and further examining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calligraphic aesthetic dissemina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in the Jiangnan literati circles of the Yuan dynasty.
Keywords: Yuan Dynasty literati; Ni Zan; literati friendships; calligraphy practice